

严绍璁 著

在观念
代，文学研
文学丛书》
新潮，探索
律，它协助
认识本民族

● 比较文学丛书 ● 比较文学丛书 ● 比较文学丛书 ●

在观念与方法论亟待更新的时代，文学研究需要走向世界；《比较文学丛书》沟通中外文学，引进世界新潮，探索各国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它协助您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深刻认识本民族文学的独创特色。

378
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

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编

严绍璿 著

责任编辑：罗尉宣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625 插页：2 字数：266,000

印数：1——1,300

ISBN 7—5404—0119—2 / I·101

统一书号：10456·273 定价：3.30元

出版说明

比较文学是一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以及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其他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独立学科。它诞生至今不过百年左右的历史，但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已经在世界文坛上站稳了脚跟，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树和批评方式，发挥自己的影响，帮助人们从更宽阔的视野总结文学的普遍规律，概括更丰富的文学现象，从而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深刻认识自己民族文学的独创性。当今各国文学家对这一学科普遍具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我国早在五四时期已开始有东西方思想、政治、社会、哲学以及文学的比较研究，解放以后，停顿了较长一个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比较文学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引起了重视，在短短几年间发展成一门“显学”，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走向世界的良好开端。

为了在对外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比较文学在我国的进一步繁荣，为了满足高等院校开设课程和广大文学爱好者知识更新的迫切需要，我们组织出版了《比较文学丛书》。

《比较文学丛书》选目注重学科本身的逻辑组合，首期工程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比较文学理论建设；（二）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三）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四）国外比较文学研究

概貌。其中前三辑由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负责编辑，第四辑由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负责编辑。乐黛云同志专为《丛书》撰写了总序。

《丛书》体例以本国学者对某一问题深入探索的专著为主，兼收国际知名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研讨专集；在方法论上，“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科际研究”兼收并蓄，力求借鉴国际比较文学界已形成的各家学派之长，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把我国乃至东方极为丰富的文学遗产和新的文学硕果，放到世界各民族文学中去，比较研究，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新的文学事业，并在这一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新的理论特色。

出版《比较文学丛书》在国内尚属新举，我们的希望是借此能为文学事业的发展扎扎实实做点工作。由于缺乏经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我们期望听到海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宝贵意见。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十月

比较文学的名与实

——《比较文学丛书》总序

乐黛云

二十世纪以来，人类大大改善了对于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懂得了必须以认识主体时间为一维的四维空间，第一次从无垠的星际世界看到人类共同生活的蓝色球体。新的认识必然引起各种观念，包括文学观念的更新，孤立、绝缘、割裂、封闭的状态已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早就预言，随着“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①在人类知识领域，各种学科相互切入、渗透、融合，各种边缘学科的勃兴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世界，正在走向综合。

二十世纪后半叶比较文学的繁荣正是这一趋势的产物。几十年来，比较文学大大开拓了自己的领域。

最初，比较文学仅仅被定义为“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正如基亚所说：“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

^① 《共产党宣言》。

渗透”^①。他们强调“各国文学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②。比较文学着重研究的是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的来源（渊源学）和媒介（翻译——媒介学）。

后来，比较文学自身的发展突破了这种只拘泥于事实联系的局限，人们发现并承认完全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也具有比较研究的价值。

从内容方面来说，文学反映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人类共有的欢乐、痛苦和困扰往往可以从全不相干的文学体系中看到。例如关于爱情与事业的冲突，我们可以从白居易的《长恨歌》、洪昇的《长生殿》看到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悲剧，也可以从拉丁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看到罗马的创建者离开迦太基皇后黛朵，造成后者死亡。另外如对于人生短暂而自然却永恒长存的感怀，对于自我的认识对于人生的领悟，对于理想的追求与破灭等都常常在完全不同的文学体系中以相同或不同的形式得到表现，构成了并无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学之间的一种可比性，这种比较在比较文学中被称为“主题学”。

从形式方面来说，一定的文学形式往往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例如小说这种文类就不可能产生于远古社会，它的出现总是与商业化、都市化和印刷术的发展有关，往往都有较大的思想动荡或新思想的产生作为其兴起的背景，都需要比较自由的语言媒体，都有强大的叙事传统作为基础，其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往往是从对现实客观世界的描写逐渐转入对人

① 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4页，198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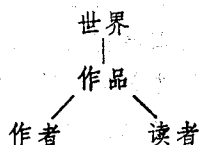
② 卡雷：《比较文学》序。

物内心世界的刻划……他如戏剧、诗歌等文类也都可以不同的文学体系中找到发展的共同规律。这些共同规律和划分文类的标准以及各种文类发展的不同途径等也构成了一种可比性。关于文类的比较研究被称为“文类学”。

关于文学发展历史的比较研究则是一门最近才兴盛起来的学问。例如关于大型诗文集的编排，西方多是编年序列，或以篇名的第一个字母为序。如荷马史诗就曾按希腊文的二十四个字母，编成二十四卷；品达罗斯的颂歌按所歌颂的庆典的时间先后为序编排。中国的诗文集则大致按文体区分。如萧统的文选：一赋、二诗、三骚、四七（“七”指特殊的文体，如《七发》、《七辩》等）……日本的《古今和歌集》又别具一格：描写自然的诗按春夏秋冬四季排列，描写爱情的诗则按爱情体验的发展顺序排列。东西方关于文学发展历史的记载也有不同方式。西方文学史很多是根据“时期”或“文学运动”来划分，中国则多半根据“朝代”、“文体”和“流派”。探索这些差异的原因，比较其优劣，发挥其特长将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文学史的比较研究与主题学的结合也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例如杨贵妃的故事从《长恨歌》到《梧桐雨》，再到《长生殿》；王昭君的故事从《汉书》中的片断记载到《汉宫秋》到《双凤奇缘》，再到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这种同一主题的发展序列往往给我们提供文化、社会、思想风习变迁的丰富信息。在欧美文学中也能找到很多这样的发展系列。例如浮士德的故事和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故事的不断改写。显然，这许多作品构成的不同系列各有自己的革新和承传，东方和西方关于这种革新和承传的过程都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

由于以上关于文学内容、形式、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越来越向理论方面发展。正如厄尔·迈纳所说：“近十五年间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是把文学理论作为专题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①人们越来越感到文学是属于世界的。离开了对于不同文学体系的综合考察，许多文学问题就难于得到圆满的解释。文学理论家们已经不满足于他们的理论只能解释某种文学体系，而是希望它既能解释西方文学，也能解释东方文学。许多学者正在探索可以解释各民族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文学理论架构。例如美国文学批评家阿布拉姆斯在他的名著《镜与灯》中提出艺术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和读者）的理论。他把这种理论归纳为一个简单的三星形：



他认为这个图形可以概括所有文学批评理论：或强调作品反映客观世界；或强调作品如何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心灵特征；或强调作品对读者的教育意义和认识意义；或把这一切都视为文学的外延分析而只注重作品本身。另一位美国学者唐纳德·A·吉布斯写了《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与中国古代文论》一文，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也纳入阿布拉姆斯的架构之中。美国加州大学叶维廉教授在探索建立一套足以概括中西文学理论的架构方面也作了许多很有意义的工作。

综合，不仅表现为类同和汇通的研究，也表现为对于殊异

①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课题》，见《中国比较文学》，1984年，第249页。

和差别的追索。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真正了解一个文学体系的特点，必须从一个外在的立足点，有其他文学体系作为参照系统才有可能。日本比较文学学者矢野峰人说：“大凡特性唯有在比较之中才更为炯然生辉”。^①越是不同的文学体系，越能辉映出彼此的特色。过去，人们总认为全然不同的东西方文学根本没有可比性，近来，这种观念已有根本改变。例如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就曾以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发展和重视理论研究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特色来讨论十五年来的比较文学，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不少院校努力把亚洲各国文学引进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不再把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各语系之内。^②无论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东方文学，或从东方人的观点来看西方文学，或用西方文艺理论来探讨东方文学现象，或以东方文艺理论来探讨西方文学现象，都会开拓文学研究领域，得出有意思的结论。例如关于易卜生的研究，如果是跟在欧洲人后面，用他们的方法来研究易卜生，很难作出什么重大贡献；如果我们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研究易卜生和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影响及发展，这种“反馈”会大大丰富关于易卜生的研究。

综合，也包含在新的基础上，在新的领域内，有关各种文学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以及某种文学体系的迁移和流播的综合研究。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说：“我们现在谁也离不开谁，是其他民族的思想培育了我们的才智……不论我们知道不知道，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是世界公民……印

① 《比较文学》，南云堂出版，第7面。

② 见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课题》，译文见《中国比较文学》，1984年，第250页。

度、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成了我们的思想源泉，而我们的思想又哺育着现代的印度、中国和日本”。^①一九二三年柏林就出版过德国人利奇温的专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②，四十年代陈铨写过《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也出现过许多文章。目前，研究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学影响的文章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要研究中国文学，不了解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全面的。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明显诱因。五四时期，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潮的传入是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重要契机。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决定了中国左翼文学几十年的动向。特别是五四时期，如此众多的世界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与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古老文明发生撞击，作为一个众多文化相互影响、冲突、排斥、吸收、改造、变形的范例，在世界文化史上实属不可多得。事实上，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印度、阿拉伯文化都出现在亚洲。关于亚洲各文化体系的相互影响还是当前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当然，综合还包含文学与人类其他思维形式，如自然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艺术形式之间的比较综合研究。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艾德治曾强调“比较文学最简单的定义可以解释为通过一个以上的民族文学的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或者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间的关系”^③。目前，所谓“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组

① 转引自北京大学《比较文学译文集》第161页。

② 有中译本，朱杰勤译，1962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③ 欧文·艾德治：《比较文学：内容与方法》，1969年，伊利诺斯大学出版。

成部分。必须突破文学研究闭关自守的状况，必须沟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等的界限，这样，就可以为文学研究输入新的生命。我国文艺界正在探索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新观念如耗散结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用于文学研究的可能性，恰与上述呼吁相合。文学与社会学（文艺社会学）、文学与心理学（文艺心理学）、文学与思想哲学（艺术哲学）的关系，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交相阐发更是急待开展的重要课题。

最后，作为各种文学体系相互沟通的手段——翻译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不可或缺的内容。

总之，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综合、联系、交流的时代。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比较文学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已形成自己独立而广阔的学科领域，正是我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我国辉煌的古代和当代文学应该真正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灿烂瑰宝而为世界人民所共享；我国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传统文学理论应该成为世界正在寻求的文学理论综合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新的文学理论如果不能解释瑰丽多彩的中国文学现象就应该说是跛脚的。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通过比较与世界沟通，在比较中研究我国文学与他国文学的殊异和类同，以世界所能接受的方式呈现自己。

从我国文学本身的发展来说，开展比较文学研究也是当务之急。经过长期的封闭与隔绝，我们特别需要以世界文学为背景，以他种文学为参照系统，重新估计自己，重新认识自己。我国文学理论将在这种重新估价和认识中完成重大突破，走向更高阶段。如前所述，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对世界各种文学比较、选择、吸收、改造，从而丰富自己的历史。正确

理解和总结我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找到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结合点，对于开拓我国文学视野，指导今天的创作都会有很大帮助。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兄弟民族都曾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如蒙族、藏族的宏伟史诗，纳西族、苗族的神话传说等。进行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不仅能促进兄弟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而且可以总结出各种民族文学的特色及其相互影响、融合而仍保持其独立完整的规律。我国又是一个侨民众多的国家。华侨在许多国家仍然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也有自己的文学。如马来西亚的“马华文学”，新加坡的“新华文学”，美国的“美华文学”。这类文学往往反映出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接触最前哨的种种动态，是研究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极好标本。另外，我国地处亚洲中部，与阿拉伯诸国、伊朗、印度、日本、朝鲜和东南亚都曾有过历史悠久的交往，在文学的相互关系方面也都有很值得追寻的历史踪迹。

无论是我国各族人民文学的比较研究、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和东方各地区比较文学的研究目前都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中国比较文学将填补这些空白，为世界比较文学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比较文学丛书》正是在以上的思想指导下编纂的。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我们希望听到读者的批评。

一九八五年六月于深圳大学

前 言

双边文学研究或多边文学研究，特别是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研究，常常会面临一些危险。这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观念与视野所限，不经意地对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学现象，振振有词地发表见解，自然会受到饱学之士的讥评，双边文学研究的名声，因此也就会被败坏；另一方面是执著于民族主义情绪的研究家，常常把对揭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的联系、排斥、包融和反馈的诸种研究，斥之为意在否定作家与作品的“个性”、试图抹煞文学的“民族性”等等。从事这一研究，有时不得不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岂不让人如履薄冰，胆战心惊。

古代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的特殊性，造成了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阐发这种业已存在了千余年的文学现象，便常常会遇上这些危险。

古代日本是属于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但是，它的文学，却是在与中国很不相同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环境内发展起来的。一般人都认为日本是一个深受中国儒学思想影响的国家。直到今天，人们甚至还称日本是一种“儒教主义”的社会。但是，如果体察日本文化的深层内容，那么，似乎可以说，儒学对于日本社会的影响，当然是远远比不过佛教的作用。在律令制时代，儒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国家制度和政治思想方面，它始终

未能真正地透入民众的生活意识之中。即使在江户时代，幕府定程朱之学为国家哲学，但是，这一时代，社会上恰是人欲横流，它的文学作品，充溢着对物欲和性欲的追求，与程朱之说，南辕而北辙。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日本文学，作家的创作意识与读者的欣赏心理，都具有与中国文学很不相同的内容和形式，两者在气质上的差异是显著的。

与中国古代的“诗教”之说、中世时代的“文以载道”论等所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观念不同，日本文学从一开始就远离政治，它仅是作为一种纯粹表达感情和调剂精神享受的手段，故而，也就绝少见如中国文坛那样，作家诗人由文学获取功名，爬进官僚阶层的情景。日本民族对于文学的这种根本观念，造成日本古代文学耽于唯美的内容和形式，不能自拔，追求所谓“物哀”、“幽玄”和“寂静”等相融或相通的境界，以求表达民族心理深层的古朴、典雅和自然返真等气质，由此而构成了日本文学的“民族性”。

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曾兴起过“兴亚论”，其功过是非，已由历史作了判定，无须我们在这里再说什么。“兴亚论”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在文化方面投下的影子，却是不可忽视的。所谓中日民族“同文同种”的宣传，始起于日本，呼应于中国，渗透于中日两国双边文学的研究之中。这种观念的潜在的侵蚀，至今时有显现，实在是我们要警惕的危险。

在日本文学发展史上，有一个现象应该引起研究家们的注目。古代日本书面文学的形成，如果以《古事记》、《怀风藻》和《万叶集》等为代表，大约是在公元八世纪左右。其时，中国文学正处于唐代极其繁荣昌盛的时期。换言之，日本古代书面文

学是在中国以《诗经》等为代表的书面文学发展一千余年之后才开始起步的，但是，到十九世纪中叶，两国文学的发展达到了大致相当的水平。当经历了明治维新的变革之后，它却于中国文学之前，跨入了现代文学的行列。何以起步晚而进步在先呢？这实在是一个足以使研究家们深长思之的问题。

这个问题，大概涉及日本古代文学的性质——指存在于这一文学深处的一种内在动力。如果从发生学的立场来考察，那么，可以说，日本古代文学是一种“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

文学的“变异”，指的是一种文学所具备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的能力。文学的“变异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如果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变异”就使新生命、新形态产生。文学的“变异”，一般来说，都是以民族文学为母本，以外来文化为父本，它们相互会合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正是原有的民族文学的某些性质的延续和继承，并在高一层次上获得发展。

日本古代文学作为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在其一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显得特别活跃，几乎没有停滞的阶段。这种共同融合而产生的文学形态，不是一种“舶来文化”，而是日本民族的文学，是表现日本民族心态的民族文学。

日本古代文学的这一根本的变异特征，便造成了古代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会合。

日本古代文学的发展阶段，与整个文化的发展相一致。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

原始文化（文学）阶段（原始时代——公元四、五世

纪);

飞鸟奈良文化(文学)阶段(公元五世纪——公元八世纪);

平安文化(文学)阶段(公元八世纪末——公元十二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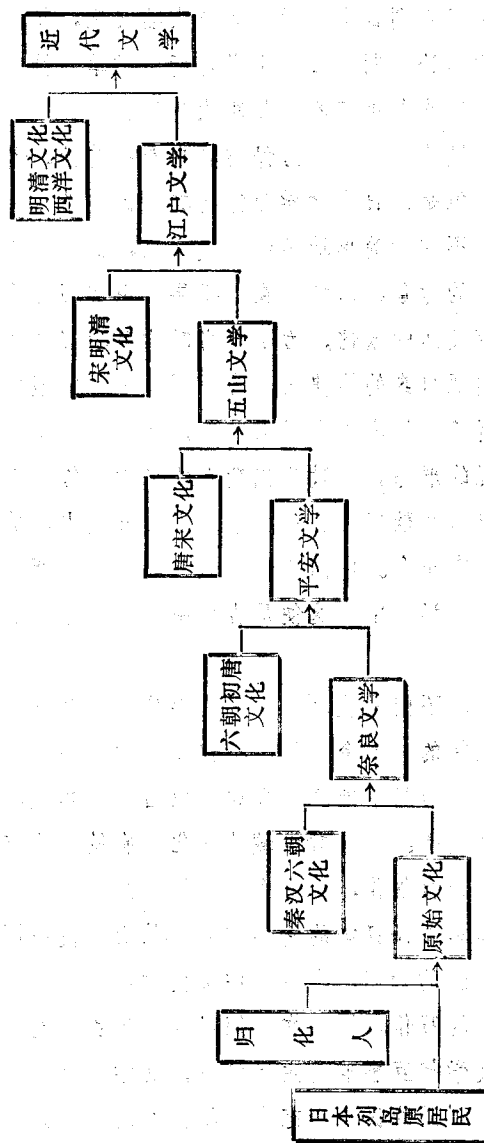
五山文化(文学)阶段(公元十三世纪——公元十六世纪);

江户文化(文学)阶段(公元十七世纪——公元十九世纪)。

日本作为一个偏居于亚洲最东部的一个海中岛国,它对大陆上的一切知识,都具有新鲜感。毋庸讳言,在古代亚洲大陆,中国文化与日本相比较,长期处于高层次的阶段。中国文化(包括文学)上所获得的成果与经验,是日本古代文学实行自身变异的主要材料。在日本文学发展史上,每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以及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文学样式的相互联系中,几乎都与中国文化的会合密切相关。(这里丝毫也不否定民族文学发展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乃至文学本身的诸因素。文学的因素便包含了文化会合的条件。)

在双边文学与多边文学的研究中,民族主义情绪是最不适合时宜的。揭示日本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模式,特别是探明中日文化与文学会合的轨迹,丝毫也不意味着否定日本古代文学的民族特性。文学的“民族性”从来也不是一个封闭性的概念。日本文学“民族性”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一文学内部的“变异性”来实现的。在一千余年的发展史中,日本文学的“民族性”得以延续不断,并充实丰富,正是因为它内具着活跃的变异性能,始终吮吸着亚洲大陆精神文明的成果。有的

日本古代文学发展中日文化会合模式示意



(这其中略除了印度文化等的因素)